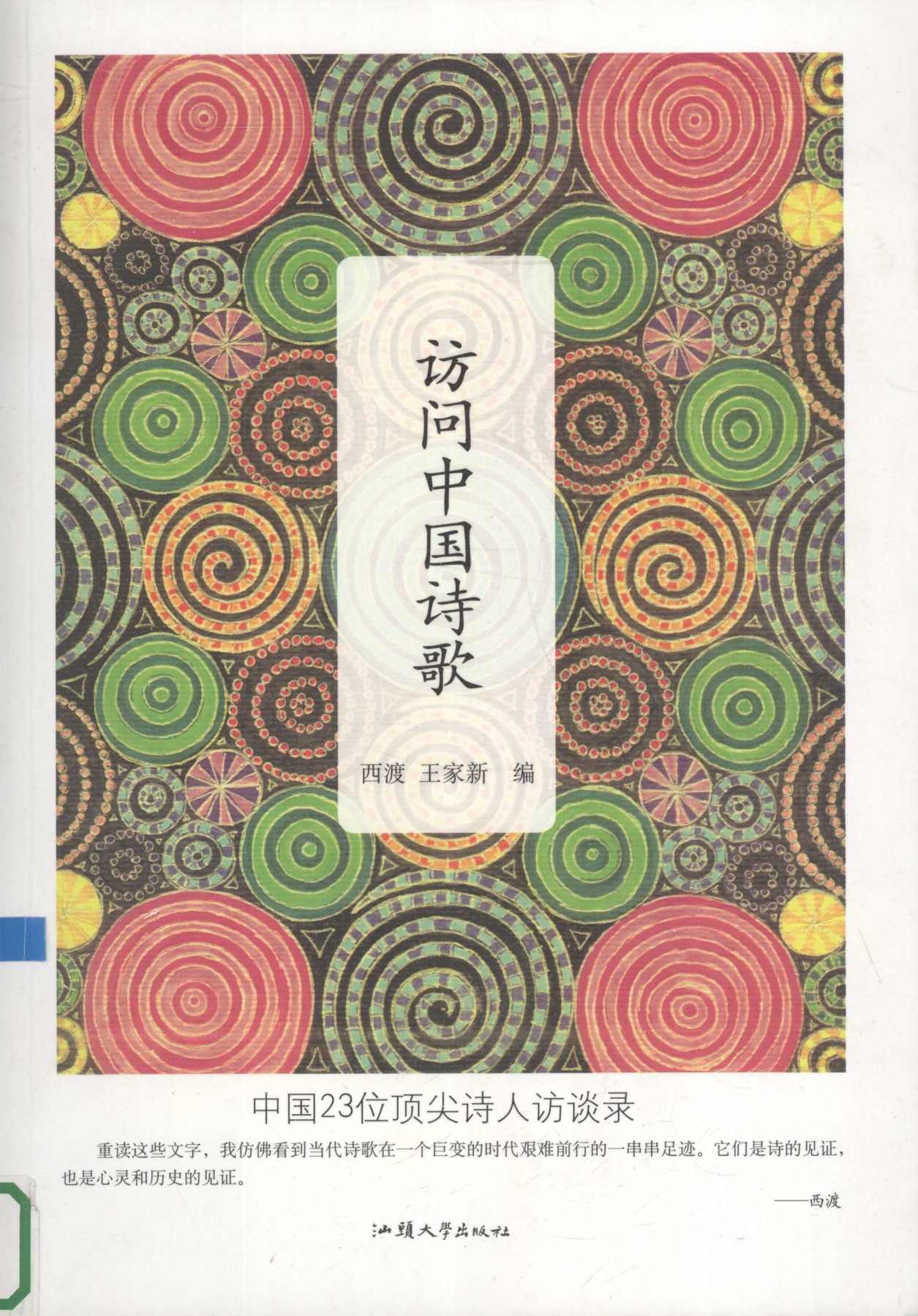




访问中国诗歌

西渡 王家新 编

中国23位顶尖诗人访谈录

重读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当代诗歌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艰难前行的一串串足迹。它们是诗的见证，也是心灵和历史的见证。

——西渡

汕头大学出版社

访问中国诗歌

西渡 王家新 编

中国23位顶尖诗人访谈录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访问中国诗歌 / 西渡, 王家新编.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 6

(创美人文书系)

ISBN 978-7-81120-362-2

I. 访... II. ①西... ②王... III. 诗人 - 访问记 - 中国 - 现代②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K825.6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0014 号

访问中国诗歌

编 者: 西 渡 王家新

责任编辑: 钱 丹

装帧设计: 海 云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80 元

ISBN 978-7-81120-362-2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印 张: 20.75

字 数: 328 千字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水荫路 56 号大院 3 栋 9A 邮编: 510620

电话 / 020-37613576 传真 / 020-8525048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昌 耀

“荆冠诗人”的最后声息

——答《青海日报》记者张晓颖 / 1

牛 汉

历史结出的果子

——答《诗刊》记者晓渡 / 8

林 莽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些寂静中的火焰

——林莽访谈录 / 18

杨 炼

“在死亡里没有归宿”

——答问 / 28

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么样

——书面访谈 / 40

柏 桦

诗人要勇敢,要有形象

——答杨键、朱朱、韩雪等 / 55

张曙光

生活、阅读和写作

——答钢克 / 65

王家新

回答四十个问题（节选） / 82

孙文波

生活：写作的前提

——答文林 / 103

肖开愚

个人写作：但是在个人与世界之间

——肖开愚访谈录 / 118

陈东东

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

——陈东东访谈录 / 134

清 平

对西渡提问的一些回答 / 156

蔡天新

诗是可以携带的家园

——答《东方时空》记者 / 170

西 川

视野之内

——西川访谈录 / 182

臧 棣

假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

——答西渡的书面采访 / 202

西 渡

面对生命的永恒困惑

——一个书面访谈 / 234

桑 克

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

——答西渡 / 256

周 瓚

期待那些特定的时刻

——答穆青的书面提问 / 272

朱 朱

“南京硕果仅存的诗人”

——朱朱访谈录 / 286

姜涛、胡续冬、冷霜、蒋浩四人谈话录 / 298

编后记 / 319

昌耀

“荆冠诗人”的最后声息^①

——答《青海日报》记者张晓颖

张晓颖（以下简称张）：您常自喻是一个“头戴荆冠”的诗人，长期以来，您和您的诗都曾受到不应有的冷遇。应该说，今天这种状况已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无论是专家还是读者，都对您和您的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此，您想说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荆冠”改为“桂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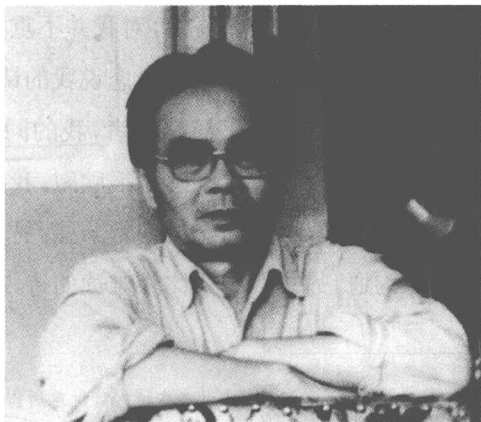
昌耀（以下简称昌）：其实凡是我写的东西，我感受到的都是时代给予我的。我在诗中写出我对时代的感受，写出我的美学追求、我的社会理想。至于是否被人接受，是否被人肯定，对我并不重要。读者层次是多种多样的，我不可能叫他们都接受，也不必强求。您说我的诗曾受到冷遇，我想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多数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我的同时代人，以至于年长一代的读者，都还能接受我的东西，这点我感到很欣慰。我的创作基本上分两大块：一个是在艺术上的有益探索，这方面比较偏重一些；另一个是抒写我的内心世界，谋求与更多的读者沟通。另外有少数比较难读的诗，在圈内被叫好和欣赏。前几年我的创作

^① 本篇为《青海日报》记者在诗人辞世前所作的专访，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昌耀订正，原载《文艺报》2000年4月4日。

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但是出版比较困难,这就使我的诗普及程度不够。在这方面,青海人民出版社做了些工作,为我出了几本书,但多数还要靠我自己发行。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比较自信的,因为我写东西不是单纯为了去当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诗人,我觉得对社会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对于美、对于善,应该做出自己的评价,包括自己的美学追求。我的诗不是游戏之作,里面都有些严肃的主题,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这就说明我的诗有存在的必要,有它的生命力,这也是我所追求的。“荆冠”是命运决定的,至于“桂冠”,那是读者给我的荣誉。这是两回事。

张:有人称您为一个宿命的诗人,这种“宿命”和您毕生追求的崇高精神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昌:我对人生的看法是,从人生最初哇哇啼哭着降生到这个世界,仿佛就已被注定一个悲剧的命运。从生到死,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顺的,都充满了苦斗这样一种精神。从这点来说,它是宿命的。但是,人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后退。我在诗里表达过这样的感觉:就像在一条船上和激流搏斗一样。此外,就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也无不血泪斑斑。许多思想家、宗教家、仁人志士都为人类的拯救或理想国的建立做出自己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现在仍在继续。如果说,这是善的精神,那么,我一生实际上都在敬重这种精神——包括基督那种牺牲自己、拯救人类的精神,包括释迦牟尼普渡众生的理想,都让我很感佩。然而善的道路是如此曲折多艰,我的《唐·吉珂德军团还在前进》正反映了我感受到的这种无奈。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有有点苦斗的精神,没有退路可走,也就是说,痛苦是绝对的,但是斗争也是绝对的(所谓“斗争”,是向命运的斗争),这种精神便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一种意思,诗是崇高的追求,因之艰难的人生历程也显得壮美、典雅、神圣、宏阔而光彩夺目。这就是我对“宿命”的理解。



昌耀

张：您在《题〈命运之书〉》一文中这样写道：“对于我，命运仅仅是一卷书。”在这卷书中您读到了什么？又读懂了什么？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您是否重新领有了自己的命运，或借助您的诗实现了对命运的嘲弄？

昌：《命运之书》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探讨命运的书，一个是对命运的书写。我生命的整个历程已经贯穿在跟命运做斗争这样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我是一个不大合时宜的人，在1950年代我是一个“右派”，到现在这个时期，好像我又不合潮流，这就是我的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我对自己的追求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在诗里毫不讳言地说过：一个诗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我觉得我的追求应该是和老百姓的追求贴得很近，这不妨参照我在书里题写的一段话：“简而言之，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公正、富有人情。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也是我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我一生羁勒于此，既不因向往的贬值而愧作，也不因俱往矣而懊悔。如谓我无力捍卫这一观点，但我已在默守这一立场……”（《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因此，我对命运始终不认可，如果我认可了，那么也许我的命运就得到改变了。我年轻时就因为命运而受难，二十多年后，我更没必要更改我的初衷。读了我的书，就知道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一卷书。我没有更改自己，没有更改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没有更改自己的人生态度。我想，在这方面，我就是我自己，我的命运是自己选择的，我是主动的。可以说，通过我的诗，我实现了对命运的嘲弄。

张：对青藏高原，您一定是有话要说的，因为您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青海的地域特征，比如《青藏高原的形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文学的角度认识青藏高原呢？

昌：我到青海来是1955年，那年我还不满19岁，那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本来可以上大学，但我热爱文学，特别是这种边远地区，对我有一定的诱惑力，所以我就投身到青海来了。在1957年，我就是因为一首诗，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所以我跟青海的关系、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它既是我自己的选择，同时又使我感到痛苦……（诗人说到这里，百感交集，潸然泪下）最近有朋友对我说过，在我的诗里，我可以摧毁一切，但在生活当中，一切可以摧毁我。我想，他说

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感到青海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对我的一生给予了许多极大的造就。我想,我是应该感谢青海的。我最后没有屈服,没有随波逐流,没有被时代所淘汰,青海的山河、人文地理、历史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青海既哺育了我,也造就了我。一个人的写作有赖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积累,从这方面来说,我对青海的感情非常密切,也是很自然的。对于青海各族群众我都深怀感情,1956年我就投身到藏区去了,最初我就在共和县河曲畜牧业合作社——这是我最早接触藏族群众,随后在农场一直和他们频繁接触,所以我对他们很熟悉。在我的创作中,我觉得,我留给青海的并不多,但是我比较满意的也就是写出了自己对他们的深切感情,写出了他们的美。我可以举例,除了刚才提到的《青藏高原的形体》,另外还有《慈航》,我是非常满意的。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个人献给青海藏族同胞的在文学上的一个纪念品。所以说,文学的青海和生活的青海是不可分割的,到了文学必须去表现它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注入了你自己的感情、个性和理想的文学家眼中的青海,它就是文学的青海。我的作品正是从这一点上去把握。

张:据我所知,目前市场上《昌耀的诗》这本书已脱销,或者说,作为精神产品,它已进入了消费领域,在此我想请您为您的现在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说点什么。

昌:许多读者都是通过刊物来阅读我的作品的,我觉得我的读者群还是有一定规模的,我常常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他们有的抄录我的诗,有的精心剪贴成册。所以说,我的诗不是进入消费领域的,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的诗进入消费领域,因为它不属于消费。我们所谓的消费,就是为消费而消费。诗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有它的时代积累价值,体现一种时代文化所达到的层次。我不希望我的诗成为地摊上的那种消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择我的诗出版,《昌耀的诗》第一次就印了一万册,他们是有眼光的,因为他们知道读者的需要。所以,你刚才的概括,我有点不同意,它(我的诗)不是进入消费领域。我的诗被大家接受,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我向出版社推荐自己的诗稿,也往往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我的诗在外地印,都不要我包销,我在外地出的第一本书是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的,一次就印了五千册,他们都来不及让我校对,结果错误百出,即便如此,五千册

也很快脱销。我的很多诗被选入各种诗集，这其中包括国外的选本，有许多读者是从选本上读到我的诗，来信说想买我的书。我想，他们都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消费愿望，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需要来买我的书。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激我的读者。

张：《慈航》被公认为是您的代表作，请您谈谈这首长诗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的主旨。

昌：每一个读者都有他自己的阅读眼光和他的生活积累，用他们的心灵去体会，这样比我说得更好。但我写这首诗，也不是灵机一动就写出来的，它是我生活积累及美学追求的一种必然产物。在那样一个极“左”的时代，尤其是像有我这样遭遇的人，能够被人理解是不容易的，所以我特别看重这种感情。这里面（指《慈航》）有自传的成分，但也不完全是自传。这里涉及我的生活，也有我周围的一些同难者，对他们被当地牧民善待的经历，我都作为素材糅和在一起融进了这首诗里。所以，诗里表现的生活是综合性的，基本上是以我为中心，写出了我对藏族群众的一种感激之情。在最后一段，我说，这个主人公并没有离开草原而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没有王笏的侍臣”留在了那里。这是我的一种信念，就是说，我永远跟他们在一起。至于《慈航》的意义，许多评论家都分析过了，在这里我不想作具体的解释了。我想，灵魂是要有栖所的，在那样一个时代里，灵魂可能比肉体更需要一个安居的地方。所以，我写的是灵魂的栖所。

张：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写诗首先是写给自己的，请您从读者的角度来评价一下自己的诗和自己的创作生涯。

昌：我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我家有不少藏书，我的父亲过去有一些在国统区买不到的书，比如香港的一些进步书籍，包括苏联的一些文学作品我从小就接触过，虽然读得不是很多，但这段经历对我养成读书的习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从小就对文学比较偏爱，曾经想当一个文学家。后来我到部队也搞文学，接触了不少年轻的诗人，自己也就开始写作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我只是出于兴趣。我对文学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是我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我到了生活的最底层。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我感到我有很多东西要说要写。我要写出我对生活的感受。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写在本子上，因为我不是

为了当诗人。一直到1979年，问题得到改变以后，我把过去写的东西都整理出来，结果大多数都发表了。后来在新时期我又写了许多东西。那个时候，我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当诗人，而是要写出对世界上许多问题的个人见解、我的社会理想，写出我对美的感受。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我就像是“一部发声器”，就像一个组合音响，它很自然地发出声音来。至于我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我认为，后面的就比前面的（年轻时写的）要更有深度一些，1957年前写的一些多半是青春年轻人对生活的向往，比较轻松；而后面时期，就多半偏重于沉重，因为生命就给了我这样一种感觉。另外，青海的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歌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的中后期作品追求的阳刚之类比较多。作为一个时代培养出来的诗人，我感到非常幸福。

昌耀诗二首

斯人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边，一人无语独坐。

思（古意）

消息是有的：说是使臣已向西出关……

说是使臣已驭柳枝来，已乘云雨来……

……过了沙墩。

消息是有的。

但我是再也等不及的了。

我满身满体满心肠都已为他郁结满了那丝。

我觉着肌肉已经灼灼胀痛了。

我青春的皮肤已经薄得透出亮光了。

我就倚在这斜坡先自筑一只茧壳儿吧。

我都已为他变作丝人了。

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湖南桃源人,1955年后长期生活在青海。曾经很长时间受到不公正待遇。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代以后引起广泛注意。出版有诗集《命运之书》、《昌耀抒情诗集》、《情感历程》、《蚕的结构》、《昌耀的诗》等。辞世前将一生作品编为《昌耀诗文总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诗人去世后出版。

牛汉

历史结出的果子^①

——答《诗刊》记者晓渡

晓渡（以下简称晓）：您从事诗歌创作半个多世纪了，请谈谈您对诗最深切的感受。

牛汉（以下简称牛）：这应该是一个最好回答的问题，但我恰恰说不好。真要说，不如说偏离了诗的教训太多。我现在常常回忆，不像布罗斯基老是背对着历史，他说曼捷尔什坦姆也从不靠回忆写诗。我却似乎连后背也长了警觉的眼睛。我并不后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当时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很好的同志，其中一些人成了烈士。我没有死纯属偶然。至于满脑子神圣的乌托邦理想，回头看，也没什么不对。人活在世界上总是要追求生命的价值。问题是后来遭遇的许多事情都令人困惑不解。当“驯服工具”，改造来改造去，越改造越不是人。结果是满脑子的神圣观念与自己生成的性格，与童年期形成的对美、自然、土地、亲人的生活经验满拧，心灵中布满了伤疤和阴影，还怎么写好诗？像《滹沱河和我》那样的创作，10年前我根本写不出来。经历了反思中再生般的回归，才有可能。当然这不是哪个个人的悲剧。

^① 辑自《中国作家访谈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7年版。

话又说回来，假如没有那么多的苦难，没有包括监禁、劳改在内的风风雨雨，我的诗也不可能达到后来的深度。这不是说没有打击，我就出息不了；而是说在我身上，时代、人生和诗是血肉不可分的。阿·托尔斯泰形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是“在血水里泡三遍，在碱水里浸三遍，在清水里洗三遍”。这也是 20 世纪许多中国作家大体相近的经历。但是，中国作家，至少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作家，没有享受“清水里洗三遍”的那种焕然一新的轻松经历。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细节，是历史



牛汉（右）与王家新

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也许将来我还会写回忆录，或者如你设想过的，写一首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式的。总之要对得起这段历史。

晓：您是“文革”中仍然坚持创作并且留下了优秀作品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您怎样看待自己那一阶段的创作？

牛：我觉得那一阶段的诗在我迄今的作品中仍然是属于最好的。

晓：能谈谈您当时的心态和写作状况吗？

牛：当时在湖北咸宁干校，绝大多数人都回到北京，我已经完全绝望，或者说看不到任何希望。是诗拯救了我。去干校时我带了几本书，有《洛尔迦诗钞》、李贺的《诗歌集》，还有借的《全唐诗》等。李贺的诗我很喜欢，他的奇思怪想令我痴迷。杜牧给李贺写序说他的诗中多有“牛鬼蛇神”，我当时正是“牛鬼蛇神”。在诗的语言，尤其是节奏上对我影响较大的却是洛尔迦，戴望舒译得很传神。《鹿子》、《悼念一棵枫树》等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那阶段写诗最单纯。我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没有读者，也没有上帝；既不想发表，更不想讨好谁，自己写给自己读。往往是吃了晚饭独自在湖边的山丘上的枫林里，边乘凉边打腹稿。身边牛在反刍，我也在反刍。

晓：您说诗拯救了您，这同时也表明了您对诗的某种信念吗？

牛：可以这么说。我不敢妄称诗人，在那种情况下我真正成为“唯心”主义者，以为能拼命写出几首诗也就是维护人，卫护诗，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有力控诉与反击。每写出一首诗，我要快活好多天。

晓：在1989年版的《牛汉抒情诗选·后记》中，您说那几年您“生命的河流经过了一个幽暗峡谷的转弯处，形成了一股深深的回流”，以致“真正觉得告别了过去的人生和过去的诗”，此中当有一段至深的心迹，能具体谈谈吗？

牛：这个话题一谈就很难收住，换个场合吧。其实开始第一个问题已说到一些。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思考中过来的。思考得很多，往根儿上说也无非是三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诗？什么是历史？许多时候很痛苦。结果使我对人、对诗有了个整体的历史的彻悟：必须这样做人，做这样的人；必须这样写诗，写这样的诗！必须这样站在历史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与过去决裂。现在我活得比较干净、完整、自在；对诗/非诗、好诗/坏诗、真诗/假诗、美/丑等等，都有了毫不含糊的看法。

晓：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假诗呢？

牛：不涉及自己的心灵，不涉及任何问题，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以及副作用的诗，必是假诗！

晓：在迄今为止的作品中，您自己认可的代表作有哪些？

牛：前些时给山西编了个选集，拟题名《头尾集》。“头”是指青年读书时期，“尾”是指平反以后，都写得比较自在、完整；中间这一段大肚子，就比较复杂了。青年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鄂尔多斯草原》，当时读高二，写得很快，没修改，有一些概念的东西，但整体说是一个梦境。1947年前后写过一首《血的流域》，长诗，没写好，不过确实用了心，语言也是自己的，《锻炼》就是从中截取的。再就是在干校写的那些诗，不是哪一首，是一个阶段，刚才已经谈到了。当然这些诗还是受历史的局限，后来的《梦游》、《空旷在远方》就有了更深的思考，眼界也开阔了。大致如此吧。如果不限于诗，我还想提到《浑沌河和我》……

晓：那虽然是本散文集，但至少我是当诗读的……顺便问一句，像在这本集子中那样集中处理童年经验让您觉得感伤吗？

牛：不。我这个人生来不喜欢感伤。有时我喜欢叹气；但这种叹气是很痛快

的，跟唱歌相似。所谓“慨叹不已”吧，非常任性、深情的大声慨叹。

晓：新诗从文化角度看一直处于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既冲突、又融合的关口上；一般认为在新诗和所谓“旧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牛：背对中国的古体传统，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值得研究。新诗的开创人物，包括后来的闻一多、冯至等都有很深的旧体诗根底，但极少写旧体诗。矫枉过正，这种情绪我能理解。不过，仅仅从文体角度区别诗的“新”、“旧”，太表面化了。废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过，不是看外国诗就能写出新诗，也不是看古典诗写出来就是旧的；“新”、“旧”与否，还是要看境界、情操，不能只着眼于外部形式。艾略特有类似的想法，大意是说所谓“传统”，就是过去的诗中超前的那一部分；而这个意义上的“传统”，和“现代”毫不矛盾。我很同意。废名当时那样说当然是有所指的。按照他的观点，譬如许多用汉语写的十四行诗根本不是中国的新诗。难道学中国古典诗就一定写旧诗，学外国古典诗就能写出中国新诗？鲁迅曾对一个朝鲜人说中国新诗经过试验不成功，我想可能是指学外国古典诗写中国新诗的试验，在他看来并不成功。当然成功不成功要看怎么看；新诗八十年在那么小的空间内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晓：您的诗和传统诗歌、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您更多地从哪一方面汲取营养？

牛：我父亲的古体诗写得很好，我小时也背过很多古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必说了；后来尽管从未写过旧体诗，但经常读，并且多有收益。李贺的诗我就一再读出新意和现代感。有些诗句不理解，但觉得很美，很坚厚，让人深深体会到汉语的分量。诗和语言分不开，但外语和汉语不一样。汉语诗歌重意象、意境，与汉语和汉语文化本身的特质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这种特质，说什么节奏、韵律？

不过，从文化的角度看，我还是受外国现代诗的影响较深。开始是俄罗斯的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等。莱蒙托夫有一首《童僧》，开头的题词是“让我尝一口蜜，我就去死”，令我深受感动。我写的《鄂尔多斯草原》主要就是受莱蒙托夫的启发。帕斯捷尔纳克、叶甫图申科的诗是后来读到的，也很喜